

从方法自觉到理论自信：蒋承勇的学术理路论析

From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to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 Analysis of Jiang Chengyong's Scholarly Trajectory

马翔 (Ma Xiang)

内容摘要：立足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与开放的比较视野，蒋承勇深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在文学思潮、人学母题、文学跨学科研究等领域形成内在贯通的研究框架，彰显了鲜明的方法自觉与理论自信。他在思潮研究中建构融合历史、理论与文化分析的方法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可持续的理论范式。他以“人学”为核心，系统阐释西方文学围绕“人”的本质所形成的发生机制与演进逻辑。同时，他推进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交流以拓展研究边界，倡导批判吸收西方理论、回归文本细读，助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构。他的教学理念与学术研究相融互促，持续创新教材与慕课建设。

关键词：蒋承勇；文学思潮；人学思想；跨学科研究；教学理念

作者简介：马翔，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与社会科学关系、唯美主义文学思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3&ZD3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to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 Analysis of Jiang Chengyong's Scholarly Trajectory

Abstract: Grounded in th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a Chinese scholar and guided by an ope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iang Chengyong has developed a coherent research framework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spanning literary currents, humanistic them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and marked by clear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confidence. In studies of literary currents, he integrate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to forge a sustainable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field in China. Centered on “human studies,” his work elucidat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Western literature. By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nd advocating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theory alongside close textual reading, h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framework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in teaching and textbook and MOOC development.

Keywords: Jiang Chengyong; literary currents; huma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eaching philosophy

Author: Ma Xiang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for Mutual Learning of East-West Civilization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19th-century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aestheticist literary trend (Email: maxiang@zjgsu.edu.cn).

在当代中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版图中，蒋承勇的学术实践具有典型的学术史意义与方法论价值。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习外国文学史、接触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课程，到80年代系统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其学术成长轨迹与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发展历程相同步。

蒋承勇始终立足中国立场，秉持开放的跨文化视野，在文学思潮研究、文学中的“人学”问题研究、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以及中西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等领域均取得重要成果。无论是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整体梳理、对“人”这一母题的系统阐发，还是对文学与科学互动机制的深入剖析，都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此种学术自觉既表现为对理论体系化建构与学理层面的深度开掘的不懈求索，亦体现为对学科内在结构与方法论边界的持续性反思。他始终保持理论警觉与创新意识，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理路与学术思维方式。

一、思潮：历史的脉络与能量

追溯其学术起点，蒋承勇在大学时代即已开启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与阶级分析方法中简单化、机械化倾向的反思。及至本科毕业后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生阶段的系统研习，他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诸多核心议题的思考已体现出突破既有框架的批评视角，并最终凝炼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一书。该书突破了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陈旧”“过时”的刻板认知，自觉运用现代系统论、心理学、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等新方法，将这一“旧话题”推陈出新、新见迭出，令学界耳目一新。迄今为止，蒋承勇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研究，在国内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与领先地位。

在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长期思考中，蒋承勇逐渐形成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深刻理解。文学思潮研究既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对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兴起。但百余年来，即便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与研究已积累一定学术成果，其整体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一方面，受特定历史阶段学术水平的客观制约，难以彻底挣脱该时期意识形态的桎梏；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阐释始终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学术建构，亦少见由本土学者撰写的系统性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专著，这无疑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出版领域的一大缺憾。

近年来，蒋承勇与其团队陆续推出《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六卷本）与《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论丛》（十卷本），逐步构建起一个以“思潮”为核心、以“文学史叙述系统化”为目标的研究框架。他指出：“所谓‘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蒋承勇等 1）。他将“文学思潮”视为一项兼具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与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这一立场超越了传统的作家—作品—流派研究的模式，转而强调文学思潮背后的文化动力结构与思想生成机制。在他看来，思潮并非单一的审美风格或流派特征，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潮流。¹这一理解突破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风格史”与“作家史”的局限，不仅具有学术开创性，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文学史叙述到思想史、文化史层面的跃升。

在《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中，蒋承勇及其学术团队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六大思潮为基本线索，对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一系列的总体设计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史意识：其编排顺序并非简单按年代罗列，而是以思想与审美形态的“生成—演化—解体”为主线，清晰呈现了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演化规律。各卷不仅探讨相应思潮的历史起源、代表作家与作品，更深入分析其哲学基础、社会语境与文化心理，从而呈现文学思潮的多层次结构。蒋承勇进一步指出，“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之全球性传播的历史进程，‘比较文学’这种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后来发展为新学科）才应运而生”（4）。这一论断从跨文化与文明互鉴的高度，为理解19世纪西方文学的复杂面貌提供了新路径。

随后推出的《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论丛》将视野从19世纪扩展至整个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历程，涵盖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十大文学思潮。作为国内首套系统研究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学术丛书，该丛书立足于反思性、超越性与建设性，将十大思潮置于西方文明与文学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既作整体把握，又分卷深入，运用跨文化、跨

1 参见 蒋承勇等：“总序”，《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六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学科方法进行多角度分析，致力于揭示其本质特征、历史地位与价值。该丛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内容的系统性以及结论的前沿性与原创性方面均有显著建树，将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推向新的水平与高度，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与《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论丛》集中体现了蒋承勇近年来的学术思想：以文学史为基础，以思想史为纵深，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以系统化研究为目标。这种研究范式打破了文学史、文化史与思想史之间的界限，构建起一种兼具整合性与创新性的文学综合叙述范式。从学术史角度看，蒋承勇的研究既延续了自钱钟书以来中国学者“以文学观思想”的传统，也回应了当代人文学科走向知识结构整合的趋势；从方法论角度看，他以“思潮”为核心构建起一个兼容历史、理论与文化分析的研究体系，为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可持续的理论范式。

二、人学：文学的母题与内核

如果说文学思潮是文化与文学的交汇点，那么文学中的人学问题便是观察这一交汇点的“观景台”。蒋承勇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文学自诞生以来，始终将人的书写与人性探寻作为其核心主题与重要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5）。文学深深扎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文学中“人”的深层母题。基于这一认识，蒋承勇依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历史嬗变，构建出西方文学观念演进的基本框架。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一书中，他就开始关注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作品中人的存在困境、自由意志、道德挣扎与精神危机。通过诸多经典文本的深度阐释，他认为文学上的“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辩证的，由于作为物质形态而存在的文学文本，蕴含了人类深层的精神—心理本原而延绵相接，“现代的文学可以说是传统文学母题的不同形态的重现，或者说是传统文学的同源变体”（5）。正是基于人学问题的视野，他突破了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对现实主义及其他文学思潮问题的既有认知与惯常阐释，这一学术视野亦贯穿于其《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人性探微》等重要论著之中。在他看来，“文化—文学—人”三者血脉相连、浑然一体。无论是中国文学、东方文学抑或西方文学，其精神内核均以‘人’的存在本质与价值诉求为根本关怀。

蒋承勇对文学中的人学问题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外国文学范畴，而是与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发展形成了深度对话，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钱谷融先生在“文学是‘人学’”（1957）一文中提出的命题的呼应、拓展与创新。作为兼具深厚汉语文功底与现实关怀的学者，蒋承勇的研究视野兼容并蓄——既立足中国立场洞察世界，又从世界的角度观照中国。他主张，人文学者应

具备国际视野与人类胸怀，“在强调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时要胸怀人类意识，而在强调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时要面向世界、吸纳他者优秀知识话语”（“避免不同的‘失语’”50）。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如何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中把握“人”的观念的本质？蒋承勇在他的研究中体现出以下方法论：其一是历史意识。这意味着对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持续反思，即在哲学意义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史观——意识到历史的发展过程（事物实际发生的过程）与逻辑的推演过程（事物内在规律的理性展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换言之，历史的真实运动遵循逻辑的必然性，而逻辑的理性演绎又根源于历史的真实过程。在他的论述中，西方文学史上“人”的形象的变迁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文化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编年史意义上的“先后”顺序，而是文化上“生成-分化-重组”的深层逻辑关系。¹其二是辩证思维，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蒋承勇并不将“人”视为一个静态、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将其理解为在历史与文化结构中不断被规定、被重构的过程性存在。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之所以贯穿古今，正是因为人性本质上具有矛盾性，始终处于对自身界限的否定与超越之中。在他看来，文学中的“人”的形象是历史文化内部矛盾运动的产物，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人”都承载着该时代的文化张力，同时孕育着下一阶段的精神种子与思想萌芽。²其三是细读文本，把握“典型”。正如“人”是具体而处境化的存在，文学中的人学问题也必须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得以展开。蒋承勇的文学批评并不高蹈地谈论抽象的人学命题，而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把握其中的“典型事实”。他一方面通过作品的细读印证理论的逻辑演绎，使抽象理论获得文学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又借助逻辑分析赋予作品以理论深度，使文学典型上升为思想的典型，形成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向阐释。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深层洞察，蒋承勇的外国文学研究始终以人学母题为核心逻辑主线，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系统性把握西方文学的发生机制与演进轨迹，进而对西方文学史建构起独具中国学者主体性的阐释体系。

三、跨界：文学与科学的对话

蒋承勇凭借深厚的学术史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不断拓展文学研究与思想史、科学史等领域的对话空间。他指出，任何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都深深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土壤。文学思潮既是特定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具象呈现，亦是科学、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多元文化要素交互作

1 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用的结果。¹因此，研究西方文学思潮不能仅停留在文学本体的内部分析，有必要将“内部”与“外部”视角相结合，展开综合性的跨学科探索。尽管文学思潮的演变离不开文学传统的内在延续，但其特质的生成往往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不少情境下，外部因素可能成为推动某一思潮产生与更迭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既然文学思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研究便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元视角，因而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路径。

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角度研究西方文学，是受西方文明发展背景所规定。“科学史-文明史-文学史”是三位一体的，科学思维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学史又是文明史的精神印记与具象表达，因此，科学思维显著影响文学思维，二者呈相互作用并相互塑造的关系。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它不仅是西方文明演进的深层动力，其精神内核、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形成、演变与转型。科学技术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而文学则对这一进程作出了深刻回应、反思与再现。因此，从科学史、文明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宏观视野出发研究西方文学思潮，有助于开辟新的理解路径，更深刻地洞察其内容、形式与观念演变的动因，并更好地把握其核心特征。事实上，蒋承勇在学术生涯早期对现实主义的研究中就已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学跨学科批评。近年来，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正是这一理念下的系统性探索，也代表了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在跨学科整合与理论创新方面的前沿方向。

回溯西方文明进程，自文艺复兴起，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理性主义与启蒙思潮的重要力量。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科学成就与科学精神的滋养下展开，重塑了人类的世界观与认知方式，促成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19世纪的自然科学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强化了理性主体意识，也重塑了文学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不仅吸收科学理念，而且通过回应科学进步及其社会影响，积极参与现代性文化的建构。蒋承勇指出，近代科学革命带来的认识论转型，使文学失去了形而上学的稳定支点，却获得了新的审美张力。文学由此成为反思科学理性限度的重要载体之一。²例如，达尔文进化论、实证主义哲学与医学话语的兴起，促使作家重新思考“人”的位置与价值——文学的现代性恰恰诞生于与科学理性之间的这种张力之中。

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工业文

1 参见蒋承勇等：“总序”，《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六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2 参见蒋承勇：“科学之于文学：‘抗拒’抑或‘接纳’？——论浪漫主义与自然科学之关系及其他”，《社会科学战线》3（2023）：146-155。

明的进步，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结构与精神面貌。从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到早期心理学与神经生理学，各学科在理论与应用层面均取得突破。这些进展不仅促成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更以跨越学科边界的方式广泛影响人文学科，对文学的观念、方法与叙事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在 19 世纪，西方文学与科学并非界限分明，而是在认知世界与体悟生命的方式上形成了丰富的互动。

作为 19 世纪西方文学主潮之一，现实主义深受自然科学尤其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观察、实验、归纳等科学方法的传播，文学家开始借鉴科学方式审视社会与人生，使文学从以先验理念为基础的模仿论转向经验写实。现实主义借助科学方法更新了叙事模式，强化了文学文本的理性观察与社会分析功能。这一“科学化”转型不仅体现为形式变革，更标志着文学在现代性道路上的重要迈进。可以说，现实主义是 19 世纪科学精神在艺术领域绽放的集中体现，它赋予文学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强化了其对社会现实与人类经验的认知功能。

与现实主义不同，浪漫主义虽以推崇直觉与情感、反抗理性著称，常被视为与科学对立，但实际上它与生物学、解剖学、化学等新兴科学之间存在深刻对话。浪漫主义并非简单否定科学，而是在批判启蒙理性与机械唯物论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更具生命感、整体性与创造力的科学-文学观。诺瓦利斯 (Novalis)、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济慈 (John Keats) 等浪漫派作家不仅关注科学进展，还尝试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心灵与精神世界的诗意图景。他们的许多作品不仅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科学的间接对话，更标志着 19 世纪西方文学在科学知识激荡下的审美重构与哲学思辨。

此外，19 世纪西方文学也反映出生命科学在叙事与心理描写中的深度渗透。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加尔的颅相学，从伽尔瓦尼的“动物电”到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这些科学理论深刻改变了作家对人类心智、意识、情感乃至命运观的理解。文学在关注“灵魂”或“精神”的同时，更加重视身体、神经活动与环境的交互关系，构建出一种具身性的人性观。这一转向不仅丰富了文学对人类复杂性的表达手段，还搭建起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桥梁。尤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对“心智活力”与“精神潜能”的探索，成为与神经生理学研究互为映照的文化现象。

进一步而言，科学不仅从理论层面影响文学，还通过技术手段与媒介革新推动文学形式的演变。从印刷业的工业化到光学成像技术的进步与摄影术的诞生与普及，再到通信技术的发展，科学革命不断拓展文学的传播途径与审美形式。这些技术进步重塑了文学的感知方式、文本结构以及文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促使文学不仅在内容上回应科学精神，而且在媒介与物质形态上发生变革。这种双重变革为 19 世纪西方文学与科学的深度互动提供了更加立体的例证。

因此，深入考察 19 世纪西方文学与科学的互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文学现代性的形成机制并把握西方文学思潮的本原特质，而且有助于推动当前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无论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科学理念的不同回应，还是技术与媒介革新对文学传播与表达方式的影响，19 世纪西方文学与科学的关系都不能简单归结为二元对立，而应被视为一个持续对话、相互激发、交融互塑的历史过程。研究文学与科学之关系，既能揭示文学作为独特知识形式如何回应并参与科学话语的构建，也能重估文学与科学在现代文明建构中的双重角色。这一路径将为我们打开一个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综合性视野，重新理解“人”作为感性与理性存在的双重本质，深化对人类文化演进逻辑的认识。

将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纳入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不仅有助于揭示文本中蕴含的科学观念、技术隐喻与知识逻辑，还有助于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理解文学与时代精神的互动。这一领域在中国学界仍较为薄弱，亟待更多关注。文学与科学的融合不应被视为零散的互文性关联，而应被理解为现代知识体系中持续发生、意义重大的深层对话。从科学与文学思潮两个维度重构西方文学史，意味着真正进入西方现代性精神与知识结构的纵深。这种跨学科路径不仅为重新书写西方文学史提供理论支持，还有助于优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体系。在追求真、善、美的深层目标上，文学与科学展现出本质上的精神契合与知识互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蒋承勇对 19 世纪西方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人文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启示。

四、经典：重读的价值与方法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的“资源库”，文学史在发展演进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经典的标准和意义。随着时代变迁、文化变更和审美趣味的流变，所谓的文学经典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移动互联网与阅读方式的变迁使经典阅读的传播与接受面临新的挑战。于是，“经典重估”“经典重读”“回归经典”成为近年来中国学界和国际学界的强烈呼声。从文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看，回到经典、重估经典的价值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学术界一度盛行的“理论热”造成了部分研究者对传统经典文本的普遍忽视、漠视甚至拒斥，不愿意从文本解读出发展开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各种新理论陆续登场、层出不穷，形成了“理论热”，但也一度产生了“理论过热”。批评界谈的是文学理论，但其结论反而多适用于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其书写方式已经远远超出文学范畴，并泛化为各学科的“话语狂欢”，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和文学阅读相脱节的现象。

这股“理论过热”风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初步质疑，到90年代出现普遍反思，其间有不少理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表达了对文学理论的“非文学化”“泛理论”和“理论过剩”倾向的不满。蒋承勇认为，面对“理论热”，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之间有历史阶段上的错位：在西方开始质疑“理论热”的时候，中国学界正值对西方理论十分热衷之际。当时中国学界对理论热本身的思考是欠深入的，对其间存在的理论与文学文本脱节之弊病的认知是肤浅的，来不及反思或者缺乏理论反思的自觉与能力。¹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在以文化研究为主导的文学研究取向影响下，西方理论界涌现的诸多新理论再度受到我国文学研究者的广泛追捧。此类理论虽不乏创新性见解与学术价值，却仍未能摆脱理论与文学文本疏离的症结，甚者呈现出反本质主义的非文学化倾向。

进入21世纪，随着许多因素的出现和变化，中国学界开始出现质疑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声音，学界对滥用西方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思批判。对这一现象，蒋承勇既对相关反思表示认同，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思考：面对学界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简单化接纳与盲目套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把责任完全归于西方理论本身的缺陷，还是应当寻找理论追随者和运用者自身的原因？他敏锐地意识到，在质疑“理论热”现象的过程中，更需警惕的是：是否在有意无意中萌生了抵制理论的潜在欲望和心理冲动？是否已经表现出对理论的轻蔑态度？他指出，在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态度上，应当保持理性与清醒的立场。² 必须看到，西方文论在其自身的思想谱系与文化语境中形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先天局限；同时，它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化土壤之间也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形。因此，作为文学研究者，既不能将其理论模式简单照搬、直接套用，也不应因其局限而完全拒斥或否定。恰当的态度，应是在批判吸收的前提下，对其合理成分予以学习、研究与借鉴，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与转化，强化经典阅读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切实承担起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

蒋承勇反对以理论证明理论、脱离文本的主观预设式批评与评论，倡导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以文本为起点，回归文本本体，借助细致研读与深度阐释，实现文学意义的重释与重构。这一立场旨在纠正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相脱节的弊病，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者可以无视理论的指导与引领。相反，理论意识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要素，与开放包容的文明互鉴视野相辅相成。我国现阶段的文学研究亟须在学术自信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

1 参见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44-445页。

2 参见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54-457页。

特色与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各研究领域的学者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吸纳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逐步实现研究的理论深化与学术成熟，摆脱长期以来理论匮乏、方法滞后的被动局面。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蒋承勇认为，应在重新梳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细嚼慢咽、消化吸收，融合本民族优秀的文论传统，形成新理论。¹ 例如，文学跨学科研究正是一条可行路径。他指出，由文学本身的知识统摄性和包容性所决定，“文学研究无可避免地也关涉除了审美性之外的与人相关的各种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统摄性而言，就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种研究本身的多学科性，也就是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学科间性”（“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70）。但他反对那种将比较文学无限扩展为“文化研究”的倾向，主张文学研究应以文学性为核心，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深化文学研究的解释力，而非取代文学研究本身。跨学科研究并非对非文学理论的生搬硬套或强制调用，而是在综合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我们的文学理论，展开比较文学方法指导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形成文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之一。² 这种立场既体现出他对学术方法的警觉，也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学术史意识”——对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自身合法性的持续反思。

五、传承：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蒋承勇始终秉持“教学相长”的理念，积极投身于教学实践与教学理念的探索。他曾主编六部教材，被多所高校采纳为本科教学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用书。他主编的教材不仅是知识的罗列，而且融入了其学术研究的深度思考。鉴于其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蒋承勇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以及“中国大学慕课优秀教师”等称号。

面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变革，蒋承勇持续关注并积极探索新型教学平台与教学模式，尤其重视“慕课”（MOOC）这一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在线开放课程形式。由他及其团队主讲的《外国文学史》（上、下）与《诗意的人学——西方文学名著欣赏》两门慕课，分别入选“国家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课程）”。这两门课程始终坚持“重读经典”的核心理念，注重文本细读，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内涵与艺术风格。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中，蒋承勇特别注重两点：一是内容精炼、问题聚焦。由于慕课单次讲授时长有限，课程

1 参见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国文学研究》3（2025）：46-51。

2 参见蒋承勇：《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60-461页。

内容需反复锤炼，确保核心问题讲得清晰透彻。二是强调开放性与普及性。慕课打破了时空与身份限制，使在校学生与社会学习者都能随时随地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自主学习，这种灵活性与覆盖面是传统课堂难以比拟的。

蒋承勇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对高等教学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移动网络既带来挑战，也拓展了新的可能。在文学教育中，慕课的优势尤为显著——它不仅便捷高效，而且能推动优质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他认为，只要设计得当、讲授精到，新技术便能为人文学科赋能，不仅不会削弱文学的深度，反而有助于文学扩大传播范围与影响力。¹因此，高校教师应积极拥抱这一新型教学形态，将其视为推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而非流于表面的时尚标签，更不应回避或轻视。目前，他正与“爱课程网”“超星”等平台合作，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课程建设。

在教材建设方面，为响应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发展需求，适应智能时代学习与阅读方式的转变，蒋承勇与高等教育出版社音像分社合作，推出《西方文学名著导引》（有声书）。该产品作为数字化有声读物新形态项目已获立项，旨在为大学生提供更便捷的新型学习资源，在全国高校具有引领与示范意义。该书定位为大学生人文素质通识课的有声教材，精选33部西方文学经典，融合“经典重读”理念与数字人文思路，通过文本细读解析作品的人文精神与艺术价值，将文字阅读转化为生动的听觉体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经典鉴赏能力、文学素养与人文素质，并在聆听中形成关于文明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视野。

回顾蒋承勇的学术和教学实践，他以深厚的历史意识、辩证思维与跨学科、跨文化视野，走出了一条在文明互鉴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清晰呈现了从方法自觉到理论自信的内在跃升。他不盲从西方理论，亦不囿于本土传统范式，而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深耕中探寻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从“人”的母题深挖到文学思潮的系统梳理，再到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探索，其学术贡献不仅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我们理解世界文学的知识框架，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姿态——通过真诚的文明互鉴，实现平等的知识对话，为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与理论建构作出了贡献。

Works Cited

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国文学研究》3（2025）：46-51。

[Jiang Chengyong. “Avoiding Different Forms of ‘Aphasia’: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and the

1 参见 蒋承勇：“移动网络与文学教育模式创新——以慕课‘外国文学史’为例”，《中国大学教学》9（2017）：53-63。

-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Intellectual Syste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5): 46-51.]
- ：《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 [— *Reassessment of Classics and Innov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0.]
- ：“科学之于文学：‘抗拒’抑或‘接纳’？——论浪漫主义与自然科学之关系及其他”，《社会科学战线》3（2023）：146-155。
- [— “Science and Literature: Resistance or Accept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Front* 3 (2023): 146-155.]
- ：“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外国文学研究》3（2020）：61-72。
- [—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0): 61-72.]
-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t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aic-Hellenic” Tradition in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18th Centu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 [— *The Motif of “Man” in Western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8.]
- ：“移动网络与文学教育模式创新——以慕课‘外国文学史’为例”，《中国大学教学》9（2017）：53-63。
- [— “Mobile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in Literary Education Models: Taking the MOOC *A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China University Teaching* 9 (2017): 53-63.]
- 蒋承勇等：《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六卷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Jiang Chengyong et al.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6 vols. Beijing: Peking UP, 2022.]